

资本暴力、深绿色宗教与贵生思想

——对《洪水之年》的生态批评解读

程 静

(南华大学 语言文学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1)

[摘 要] 阿特伍德的《洪水之年》以现实主义基调设想了未来美国“技术滥用”与“资本暴力”相结合的后人类语境,凸显了晚期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与人类生存之间的张力,再现了资本主义消费文化的暴力与“公司警”统治的僵化所带来的物种灭绝与人类灭绝的生存危机。文章以生命哲学为视角,剖析了小说中的环保主义宗教组织“神之园丁”对传统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生态观的调整与矫正,指出小说借“亚当第一”的布道与园丁们的生态实践,批判晚期资本主义唯利是图与戕害生命的僵化本质。文章认为,小说颠覆了原教旨主义所奉行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准则,写出了深绿色宗教的实施路径与内在机制,引导读者以“生存第一”和“敬畏生命”为原则,抵制资本暴力,尊敬所有生命的固有价值,以重返简朴、有益于生命的生活模式,保护人类与非人类生命。

[关键词] 资本暴力; 深绿色宗教; 生存第一; 生命的固有价值

[中图分类号] I711.0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20)06-0115-08

DOI:10.13967/j.cnki.nhxb.2020.0103

加拿大女作家阿特伍德的“疯狂亚当”三部曲由《羚羊与秧鸡》(2003)、《洪水之年》(2009)、《疯狂亚当》(2013)构成。总体上,它们呈现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技术危机、生态危机、政治危机与人性危机,是恶托邦科幻小说。它们对人类命运的考察与反思被放在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宏大时间框架与全球空间框架中,具有时间与空间的整体性视野或宇宙视野。这一宇宙整体视野,既有关于未来不羁的想象力,又立足现实思考人类未来,具有浓重的现实主义色彩。小说从政治、经济、技科学(techno-science)、生态环境等多角度叙事,设想了在未来极度恶劣的生存环境中,人类何去何从的问题。三部曲故事情节与人物塑造扎根于美国社会的日常生活,具有现实主义的叙事语境和反思性小说的特征。同时又以极端化的瘟疫叙事、以对身体之死与精神之死的复杂状况的审视、以对人类未来的忧患意识与人类自我毁灭特性的反思,促使读者思考人类存在的意义与人类的自我拯救。如果说《羚羊与秧鸡》是后现代技术批判的道德寓言,《洪水之年》则延续了《羚羊与秧鸡》所设定的晚期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与文化背景,仍然以对大瘟疫之前的回忆与之后的反思,深化了“技术与灵性”、“法律体系与资本暴

力”、“上层阶级与下层贫民”相碰撞的语境,并重新界定了传统宗教对环境保护的意义。

《洪水之年》的故事发生在大瘟疫之后,标题暗示的“无水的洪水”,指的是晚期资本主义政治体系下技术失控与人性畸变等所带来的世界范围的大瘟疫。这一瘟疫叙事仅仅是故事展开的背景,小说的中心议题是当代美国社会恶劣的生存环境,即市场经济的政治化、跨国公司对大众的全景化监视与暴力化统治、基因技术的滥用等因素所造成的生命毁灭。小说未能清晰交代科技公司接管政府权力的过程,但对资本主义永不满足、不择手段的利润追求与高度发达的、不受约束的基因技术之间的本质联系有所揭露。同时再现了“神之园丁”如何突破资本暴力下的人性败坏、道德败坏、政治败坏、对女性的践踏与凌辱,践行新的“绿色宗教”理念。小说围绕着这种对比,揭示了资本主义体系的痼疾与生态危机之间的内在联系,谴责了资本暴力对动植物生命与人类生命的蛮横干预与操纵。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文明对自然的干预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当基因技术发展的加速度已超出了有益于生命的限度时,失控的基因技术失去了它存在的合理性。人为的基因灾祸,意味着现代性的垮塌。而绿色宗教在实践

[收稿日期] 2020-11-27

[基金项目]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当代美国文学中的技术批判与反思(1945-2000)”资助(编号:16YBA322)

[作者简介] 程静(1966—),女,河南信阳人,南华大学语言文学学院副教授,博士。

中的力量虽然弱小,却具有抵制邪恶人性与资本暴力的坚韧。在社会公权力与地下世界勾结在一起肆意收割人们生命的语境下,环保组织“神之园丁”的绿色生活实践为大瘟疫后的人类保留了一丝生态救赎的希望。本文将从深绿色宗教与生命价值的视角,解读《洪水之年》的资本暴力与技术失控背景,以及该小说作为时代寓言所传达的生态意蕴,认为小说高扬了生命价值高于一切的精神,提倡对所有生命(包括动物、植物生命)的关爱与敬畏。

一 资本暴力之下的生存危机

在资本主义社会,无论是在原始积累的资本主义时期,还是在晚期资本主义时期,资本都具有或隐或显的暴力特性,拥有剥夺臣属的、被边缘化的社会大众的合法路径。《洪水之年》虚构了资本暴力与技术精英统治相结合的基本政治框架。在此框架下,掠夺性市场逻辑被扩展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资本统治发展到极致,大型跨国公司的公司警取代了政府的法律职能,进而引发了系列严重后果。人类的身体与尊严被蹂躏,环境被持续劫掠,动物种属的存在权被剥夺,并最终导致了“无水的洪水”(大瘟疫)的肆虐。摆脱了法律与道德约束的技术、恶劣的人性、资本暴力三种因素聚合在一起,人类和其他动物的生命受到了死亡,甚至灭绝的威胁。

小说中的晚期资本主义恶托邦世界由两部分构成:(1)统治阶级由跨国公司体系及其豢养的公司警、技术精英组成。这些人居住在安保严密、物质丰盛的公司大院,但精神极度贫乏,思维狭隘而偏执。(2)贫民阶层居住在危险、破败的“废市”,承受着技术暴力对身体与灵魂的戕害、资本利润追逐下环境的恶化、黑社会暴力等多种恶果。大瘟疫既来源于跨国公司对绝对利润的疯狂追逐,大公司取代政府职能所造成的社会失序状态;也来源于热衷于基因技术、对晚期资本主义统治体系极度憎恶的疯狂科学家秧鸡的故意设计、诱导与病毒的传播。为大公司工作的科学家们,虽然物质生活有保障,但要努力确保自己不被绑架、暗杀或驱逐出特权阶层,就要违背良知与正义,配合公司的超级利润追求,把自己变成赚取利润的机器。他们生活在恐惧与焦虑中,精神压力大,承受着资本对他们的生杀予夺。

这一语境下的科学研究与基因技术实践,已经背弃了造福全人类、促使社会进步的伦理原则,成为人类冷酷践踏其他动物的物质手段。过于繁盛和不受约束的商业活动,不仅诱导出攀比性的不必要消费、消耗有限的地球资源、制造大规模的垃圾污染,

而且使消费者的心理趋于浮躁,以物质挤压人类的灵性空间。有些商品既无实用价值又无美学价值,纯粹是诱导人性欲望,操纵人性的弱点,使人类沉迷在物质欲望中。持续垮塌的生态系统使多数人的生活艰难,似乎包括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在内的大部分人类被困在短视的愚蠢中。整个时代被物质的浮华迷了眼、被个人的任性所支配,看不到什么才是人真正的需要。富裕的消费者们不计代价,追求年轻的外貌、尽情的性生活、永恒的自我;而下层社会的人们吃着合成食物,生活在贫民区,被视为“鼠民”,生命也被任意剥夺。

资本的无限扩张与资本家不择手段攫取超额利润的本性不可避免地引起资本暴力,并造成施暴者的人性畸变,毁坏社会与自然资源;追逐超额利润的本性,不仅促使资本家阶层依赖技术发明进行产品更新,而且促使资本家阶层不断洗牌;同时,晚期资本主义体量过大,遏制了有益于所有生命形式的环保创新,造成了自身的僵化。小说以淡然的叙事语气,讲述着普通民众所经历的资本暴力,展示了资本暴力如何使他们从活生生的主体沦落为供垄断资本统治阶层践踏的客体。科学家秧鸡通过把含有人工合成病毒的保健品投放到市场上,引起了全球性大瘟疫。而该瘟疫被“神之园丁”绿色宗教组织视为“无水的洪水”。它“仿佛乘着翅膀穿越空气而来,如火海般在城市蔓延,携带病原体的暴众不断扩散,随之扩散的还有恐怖和屠杀。到处都停电了,新闻断断续续:维护系统的人死了,系统也随之崩溃。看起来确实像一次全面毁灭……”^{[1][22]}。这一“诺亚方舟”神话模式暗示着被灭绝的动物将永远不复存在,被留下的人类也将是极少数。凄惨的场景随处可见:人们随时会倒毙在汽车里、草坪上。因为无人维持系统的运转,所有人工的创造物都在日渐损毁;大型器官猪逃出实验农场,四处游荡,天然进化的动物被极大地剥夺了生存空间。人类近乎灭绝,街道空空荡荡,寂静无声。

小说的故事被预设于2025年的美国,时间背景是最近的将来。细读文本,读者会发现,小说的情节结构建立在对当今美国、西方僵化的资本主义体系深入洞察的基础上,具有坚实的现实主义叙事基础。从《羚羊与秧鸡》的技术叙事可知,技术创新是跨国公司实现超额利润最有效的途径。科技人员所处的困境大致在三个方面:(1)资本的冷酷在于它对技术人才的衡量标准是“有用”和“赚钱”。这种意义上,科技人员的生存受到资本暴力的辖制。(2)科技人员的自我实现不仅依赖自身的才智,同样需要

团队的合作与科研平台的支持。资本为科学家提供了物质支持,同时也划定了他们的研究方向与研究目的,使他们既有对世界的优越感,也有不能用技术造福人类的痛苦。在毫无道德约束或全然服从资本目的的科技人员手里,技术被用于灭绝天然物种,剥夺他人自由和生命,具有不可逆转的邪恶作用,例如,跨物种基因合成技术的发明与应用。这是一个过分发展的世界,技术发展的方向也是由技术应用中跨国公司获得绝对利润的速度和效度决定的。

公司政体与黑社会暴力勾结在一起,表现出极端的“食肉(devouring meat)本性”,形成了对女性身体的摧残与消费,对人类物种的整体性毁灭。因法律的严苛,托比不能解释父亲的自杀,只好不断地逃亡,打黑工。在打工过程中,她不幸成为黑社会暴徒、“秘密汉堡”零售店经理弗兰克的众多性虐对象之一,几乎失去性命。此处的“肉”(meat)具有多重文化含义:(1)“肉”意味着生命体之间的吃与被吃的权力关系。动物被当做“肉”,被基因技术剥夺了生命的自主权^①和物种的独立存在权。这种意义上,“肉”意味着物种之间的生态关系,女性被当做“肉”,被男性以色情的眼光“凝视”和消费。如此,“肉”意味着被凌辱的女性所承受的物化与人格尊严的丧失。(2)隐喻意义上,人类生命也成了“肉”,任由资本暴力践踏、毁灭。中产阶级的自立、勤劳、坚强等美德在资本暴力面前不堪一击。令读者惊惧的是,小说中极度富裕的人享受珍稀动物的肉与皮毛;而普通顾客吃的则是意味不明的“合成肉”,其中会有猫毛、老鼠尾巴、人的指甲。“秘密汉堡”的绞肉机亦无法掩盖其真相,统治者之外的所有生命,都成了可以吃的肉。资本暴力对生命价值与尊严的践踏,可见一斑。

晚期资本主义政体的僵化,体现在技术与资本的畸形发展与肆无忌惮地掠夺普通民众,使中产阶级沦为无产阶级,使贫民阶层陷入赤贫等方面。主人公托比一家本为中产阶级,但因房地产公司的扩张,他们的土地被不择手段地劫掠。在公司警^②统治尚不很猖獗、基因合成技术尚未全面介入生活的时代,托比与父母“一直住在近郊的一栋白色木屋里,四周围绕着十英亩的树林。这里曾经有松鼠栖居……鹿儿成群出没”^{[1]26},但他们无法避开过分发展的商业与技术至上的社会洪流。随着公司警对他们的控制越来越严,地产开发商逼迫他们卖房子,但托比的父亲坚持不卖。父亲丢了空调公司的工作,新的工作工资缩水母亲因爱惜自己的身体而每天服用“荷尔史威瑟”公司的“高蛋白核心维生素E补充

剂”,染上秧鸡发明的瘟疫。为了给母亲治病,父亲先后申请了两次抵押贷款,卖掉原有的房子、汽车、家具,搬迁到更差的房子。父亲的努力终究没能挽救母亲的生命。在母亲葬礼之后的当天,父亲因绝望而用他非法持有的来复枪自杀。在严苛的“公司警”法律体系下,托比有可能被控为“非法持枪现行犯”的女儿或“谋杀罪”,所以她只能隐姓埋名,逃到“废市”生存。

资本暴力所产生的后果,并不局限在经济方面,也渗透于社会生活与被统治者的个体生命体验中。在“废市”,人命贱如草芥,公司警对待外国移民的方法是“开枪、挥铲,然后沉默”^{[1]32}。对待本国底层民众,公司警与废市黑帮勾结,组织绑架和暗杀,经营毒品和色情生意,把尸体变成“秘密汉堡”的原料。合法的工作控制在公司手里,托比找不到合法的工作。为了生存,她不断打黑工,甚至卖头发、卖卵子。在第二次卖卵子时,她因针头感染而大病一场,并失去了生育能力。之后,她在黑帮控制的“秘密汉堡”零售店打工,并被经理弗兰克暴力凌辱、性虐待,绝望一点点地吞噬了她。正如阿特伍德在与罗斯切尔德(Rothschild)的访谈中所言,人们并不想要商业与政府的融合,而是希望商业之手不要干涉政府的法律体系,这种融合会带来超级腐败^{[2]61}。

对于“他者”的严苛惩罚,也构成了晚期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的一个因素。小说中的大公司政体已凌驾于国家政体之上,公司警掌握着生杀予夺的权力,而权力的根源可追踪到跨国公司对利润的疯狂追逐。他们忘记了物极必反、极度同质化统治会把自身逼向灭亡的道理。在他们看来,贱民是消解中心的力量,需要严厉的惩罚与监视。然而,他者的存在,往往给社会整体带来旺盛的生命力,是磨砺、完善自身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统治者沉浸于剥夺他人的权力快感中,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自掘坟墓。对他人的欺压、生命的剥夺,反倒使他们自身面目狰狞,丧失人类尊严,成为仅剩逐利本能的怪物。此种情况下,民众所面临的是政治、经济、技术、文化等多方面因素交汇引起的生存危机。

技术垄断与资本垄断的高度融合不仅保障了垄断性资本主义大公司极度的利润追逐,同时也摧毁了人性中最美好的素质,摧毁了人类的地域感,使人类的异化达到了极致。民众的弱小与公司的强大、溢美之词包裹下的商品宣传与掠夺生命的新产品开发、盛行的物欲追求与小众环保组织的极简主义环保理念之间的矛盾激化,形成了社会阶层之间的巨大撕裂。小说开放的故事结局警示读者,人类未来

所遇到的已不仅仅是如何对抗物质贫困与精神贫困的问题,而且是人类这一物种能否继续存在的问题。“神之园丁”的生态实践表明,也许绿色宗教是人类走出生态与生存危机的一个路径。

二 反原教旨主义的深绿色宗教

巴恩希尔与戈特利布曾指出,“深层生态学指的是对环境伦理和环境问题起因的深刻追问。这种追问不是简单地调节现有政策或修补习以为常的价值观,而是导向对各种基本的世界观的批判性反思。通过深入调查具体的态度与环境实践背后的世界观,深层生态学不可避免地要关注宗教教义与灵性态度”^{[3]5}。不可否认,宗教在世界观的塑造和全球环境政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与罗斯切尔德的访谈中,阿特伍德说因为自己的父亲是森林昆虫学家,所以她认识到不应该在森林里喷洒杀虫剂,因为这样做适得其反,会杀死其他动物,危害与森林接触之人的健康,故而她对环境的关注是生来就有的感受。当下的生态危机非常严重,我们大家都活在“救生艇状态”^{[3]61-62}。这种生态危机忧虑在《羚羊与秧鸡》中已有细致描写,《洪水之年》对它有更深入的探讨。《洪水之年》通过聚焦亚当第一的生态布道与“神之园丁”的生态实践活动,体现了作者的绿色宗教思想。

美国环境伦理学者泰勒(Bron Taylor)曾辨析过“自然宗教”(nature religion)、“绿色宗教”(green religion)、“深绿色宗教”(dark green religion)三个概念。首先,“自然宗教是最常用的涵盖广的术语。它指的是以敬畏自然为荣、以毁坏自然为肮脏的宗教洞见与实践。其跟随者们常常描述人类与地球的密切关系与对地球的归属感,也就是对地球生态系统的依赖”^{[4]5}。同时,多种自然宗教的共同内核是“自然宗教(natural religion)、自然敬拜(nature worship)、自然神秘主义(nature mysticism)和地球宗教(earth religion)”,其实质是泛神论、相对于基督教的异教思想、万物有灵论^{[4]5}。泰勒认为自然宗教赋予无生命体和自然之力以意识,扎根自然环境,使人类对自然有敬畏之感,不应被视为野蛮人或东方人的原始宗教,反倒是在生态上高于所谓文明人,是值得称赞的。他把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同时归于“自然宗教”与“深绿色宗教”思想体系,认为卢梭对自然的灵性认识、对物质至上生活方式的批判与后来的深绿色宗教有共通之处,为宗教的绿色化(the greening of religion)打下了基础^{[4]6-10}。其次,泰勒认为绿色宗教视“环境友好型行为”为一种宗教责

任^{[4]10},而深绿色宗教源自欧洲和美国,视“自然”为圣洁,认为“自然”具有固有的内在价值。它没有圣洁的文本,没有公认的领袖人物、宗教等级,只是一种以环境保护为精神实质的信念,在现实生活中可能会被原教旨主义者视为异端^{[4]18}。

正如环保人士宾汉姆(Sally G. Bingham)所观察的,“一个宗教运动正在美国兴起。这一运动把强有力的价值观与道德情操带到了对话中,以制止全球变暖所引起的灾难”^[5]。“在教会,我了解到上帝置人类于花园中,是为了让他们耕作与守护。然而,我所见的是,我们并非很好的园丁。在我们所宣称的信仰、我们所渴望保护的、我们如何对待邻居和地球三者之间存在着割裂。《圣经》要求人们敬畏地球,但教堂里的人们错失了《圣经》要求他们‘敬畏地球’的真正意义”^{[4]56}。小说把深绿色宗教的理念渗透到“神之园丁”这一边缘性宗教团体的绿色生态教义与生态实践活动中,再现了改良的基督教教义和价值观,是应对大瘟疫以及极度失衡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尝试。小说融合了最好的生态保护群体与最坏的社会环境,在惨淡语境中给读者留下了希望。

“神之园丁”是一个环保主义宗教社区,不仅仅是被侮辱与被迫害的社会底层人员的代表,也是在末世混乱中有信仰、坚守生态宗教灵性的一群人。他们所信奉并融入生存实践中的宗教,并非就是西方传统的基督教,而是混合着萨满文化意味、为应对生存危机而调整了自身信条的“环保主义宗教”。他们内部实施集体管理,有自己的圣人、赞美诗与宗教节日、礼拜仪式和时间纪年。“从基督教会荣耀动物的祈祷仪式,到强调与自然界相互依存的佛教冥想,宗教仪式一直被而且将会被创造着、被实践着。仪式被认为是灵性生活的一种技术,使人们甚至在大毁灭中也能庆祝,集体性正式表达对我们所犯的生态罪孽的懊悔之情”^{[2]3}。他们提倡回归传统,不信任技术公司开发的药品,追求简朴的生活,依赖草药和天然材料的混合制剂治病。

三部曲的末世叙事表明,阿特伍德不仅意识到在生态危机发展到极端的状态下,人类已成为濒危物种,而且认识到深绿色宗教可以成为生态危机的解毒剂。自1967年怀特(Lynn White)发表《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一文以来,学界普遍认为原教旨主义基督教强化了人类与自然的二元对立,加重了人类中心主义文化氛围,并使人们对非人类生命充满了冷漠与敌意。西方人即便不信教,也依然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正如巴恩希尔和戈特利布所言,

“必须承认,无论宗教人士对地球的态度如何,如非有人点醒,宗教传统在很大程度上对环境危机是视若无睹的”^{[3]2}。阿特伍德借用园丁们的绿色宗教亚文化空间,试图重新摆正自然与文明的关系:重返自然并不意味着抛弃人类文明,而是要在认同、爱护、敬畏自然的同时,约束人类个人与群体的欲望与贪婪,达到文明与自然长期和谐共存的目的。

《洪水之年》采用了大灾祸后主人公托比和瑞恩的回忆与“神之园丁”宗教派别节日和布道交替出现的叙事策略。它的开篇是一首题为《花园》的园丁口传赞美诗,赞美自然的奇妙并哀悼人类的贪婪毁掉了动植物与水资源。亚当第一是“神之园丁”的代言人和最重要的领导人。他定期向园丁们布道,按照环保主义宗旨解读基督教教义。这种意义上,园丁们背弃了原教旨主义对《圣经》机械的、字面的解读。他们的信仰体现了当代宗教在生态危机之下所做的自我调整、自我批判与自我完善,体现了“生存第一”的责任意识、“知行合一”的生态理念,是一种以万物为本、以生命为本的宗教改革和进步。

首先,亚当第一关于“创世”的解读挣脱了宗教自身的狭隘观念,强调了人与动物的亲缘关系与平等地位,体现了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的谦卑态度。“神亲自将那些动物召集起来……他用的是每种动物自己的语言。对驯鹿他说驯鹿的语言,对蜘蛛他说蜘蛛语,对大象他说大象语,对跳蚤他说跳蚤语,对蜈蚣说蜈蚣语,对蚂蚁说蚂蚁语”^{[1]15}。园丁们奉行素食主义生活准则,谴责人类的贪婪与杀戮破坏了人与动物之间的兄弟情谊,并使动物们饱受欺凌^{[1]16}。而大公司基因合成的蔬菜与器官猪等动植物与园丁们对天然生命的爱护形成了尖锐的对比、反讽与张力。“葛蛾是为了控制侵害性野葛而制造出来的转基因合成生物,但它们似乎更偏爱菜园里的蔬菜……设计者把葛蛾的头部做成一张大眼睛、笑容夸张的娃娃脸……这些毛毛虫隐藏在天使面具底下龇动下颚狼吞虎咽”^{[1]18}。

其次,园丁们努力践行极简主义生活准则,克制对自然材料的使用。他们所有的锅碗瓢盆都是从废品中回收的,用米糠和麦秸秆填充床垫,从不使用烘干机烘干衣服。在城市贫民区废弃建筑物的楼顶,他们种植蔬菜,养蜜蜂,试图弥合信仰、科学与自然之间的距离。尽管生活近乎赤贫,靠捡废品和回收富人扔掉的食物、肥皂、酒为生,他们仍然快乐地把这一套生态理念付诸生活实践。他们对上帝、命运、敌人表现出浓烈的兴趣,努力拯救受侮辱受损害的

人,敬畏生命、敬畏自然,把死亡当做自然的过程加以接受。他们敬拜上帝,但又从进化论的角度承认人与动物之间的平等的亲缘关系。园丁所接受的教导是,“秃鹫是我们的朋友。它们净化大地。它们是上帝派来消解肉体不可或缺黑暗天使。想象一下没有死亡的世界将会是多么可怕”^{[1]3}。小说中,作者并置了无人可以逃避的生存危机和“神之园丁”对自然、生命的热爱与认同,试图以严峻的人类物种灭绝想象为警钟,唤醒人类对生命的忧患意识。孩子们上自己的生态学校,由园丁中的佼佼者传授给孩子们“纤维回收利用课”“厨艺课”“养蜂与真菌学”“整体治疗与草本修复”等科学知识与自然宗教知识。“神之园丁”内部安于贫困并具有强健精神性的亚当与夏娃们帮助女性摆脱经济、心理与生理的脆弱。例如,托比是一个城市地下暴力的受害者,但在“亚当第一”的帮助下,最终逃离了“秘密汉堡”零售店经理的死亡性虐待,加入了“神之园丁”组织。宗教灵性赋予她身心健康,使她免于精神崩溃,并成为该组织的中坚人物。

再次,园丁们敬拜的“生态圣人”与深绿色宗教的做法是一致的。其中,有现实生活中拯救大猩猩的福西(Dian Fossey)、《寂静的春天》的作者、为被杀虫剂大面积杀死的鸟儿代言的卡森(Rachel Carson)、天然饮食的提倡者吉本斯(Euell Gibbons)、投身环保事业的阿尔·戈尔(Al Gore)、加拿大倡导宜居城市的社会活动家斯帕罗,这些为环保事业而奋斗的人们被命名为“圣”(saint),被以节日与敬拜仪式的形式赋予了崇高的地位。

三 “生命第一”的环保理念

三部曲对“生命价值”的关注贯穿始终,而《洪水之年》敬畏生命的理念尤为突出。尽管小说的情节设计存在着漫画式的夸张与简化,但作者抓住了当今风险社会的危机本质,在再现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文笔细腻,对世界宗教(world religion)在抗击生态危机与人类生存中所起的作用充满信心,并在似乎不经意中传达了生态整体论与“生命第一”的环保理念。如果说后基因技术社会是一个整体,公司“大院”、“废市”、各个“黑帮”、各种宗教小团体就是构成整体的各个部分;如果说自然界是一个整体,而人类和所有生命一样,就仅是其中的一个部分。整体与部分/个体之间,部分与部分之间,并非二元对立的关系,而是相互依赖、互补与融通的关系。“上帝的园丁”恰恰表达了这一生态理念。与“大院”里的统治阶级和技术精英相反,园丁们胸怀整

个社会福祉,视人类个体、人类不同阶层、动植物物种、生态系统、整个自然界为一个整体,认识到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关联,以及各个部分与生态整体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拒绝跟从当代垄断资本主义流行文化所宣扬的“极度消费、极度享乐”的物质文化价值观,经常外出传扬极简主义生活理念,并在自己的社区实践这一理念。

在整个社会大环境中,“神之园丁”是小众团体,其抵制生态恶化的方式是游击策略,在夹缝中生存。整体上,他们承认进化论与基因梯序。他们的所作所为内含着一种反物欲的、既灵性又身体的、不伤害他者生命的生存方式,这种生存方式应该成为每一个关心人类生命质量的地球人的生存方式。“神之园丁”如此界定“生命与灵性”的传承:“灵从一张嘴传到另一张,而不是从一样事物移到另一样;书可能被烧毁,纸可能被揉碎,电脑也可能被破坏。唯有灵永生同在,因为灵不是物质”^{[1]7}。谈到创世与动物的命名,亚当第一的宣讲强调所有的生物同胞、哺乳类同胞的生命价值。园丁的赞美诗吟唱道:“我欲放声讴歌,那沟边的神圣野草。它们是谦卑者的粮草,不是富有者的佳肴。”^{[1]29}在讴歌各种植物的花朵、根茎、果实与青青绿色之后,劝导人类要做“惜树人”,并对自然的馈赠怀有感恩之心。“马齿苋、羊腿藜,便是荨麻也可吃。山楂、接骨木、漆树和玫瑰——各出丰美果实于其中”^{[1]30}。“……圣戴安日,纪念物种之间的心意相通”^{[1]317}。他们对基督教教义的新解释,体现了小说所倡导的生命哲学,即地球上所有的动植物生命都有自身的固有价值,每个人都应该敬畏生命,珍爱生命。他们在“人与自然”关系中的去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已修正了《圣经》中的部分表述,甚至持与原教旨主义相反的观点。在谈到人类对自然的基本经验时,巴恩希尔曾指出,作为人类,“认识到自己是宇宙万物整体的一部分,能够使自己抛弃狭隘的自我观念,拥有充分融入‘自然’,并以‘自然’为家诗意地栖息其中的感觉,驱使自己做出环保行动”^{[3]78}。

垄断资本的超额利润追逐推动了技术发明的加速度与技术伦理的崩塌,把自身价值观强加于整个社会,践踏人类的整体利益,使人类丧失了把“生命第一”推己及人的高贵情感。小说把“生存第一”伦理原则,从人类扩大到所有动植物生命,批判“金钱驱动”伦理原则的狭隘、肤浅与卑下。“十年前这里遭遇了一场大旱,人们发现把幸存的奶牛杀掉比把它们通过海路运出去要便宜得多。所以现在威斯康星州遍地都是牛骨”^{[1]58}。绿色环保组织“上帝的园

丁”回归传统、回归自然,执着于环保,坚守着素食、低技术、非暴力、生存第一的生活方式。他们所追求的灵性成长、简朴的生活方式、对生命(包括动植物生命)的热爱、对拯救世界的执着,具有重要的环保意义。

小说虚构的动物实验之伦理基础,是人类自认为不同于其他动物,居于食物链、进化等级金字塔的顶端,人类拥有灵魂和语言,天生优越于其他动植物种。缺乏“物种濒危”意识、生命贵重观念的科学家们,肆意进行基因实验,用基因技术合成更多的动物。这种行为是反自然的,并潜藏着许多未知的危险,践踏了整个生命界的尊严。生命如链条一般代代相传,充满了勃勃生机,既有挣扎的苦,又有活着的欢乐与满足。渥格尔(Lawrence Vogel)指出,生命本身是纯真的,“有生命的‘自然’本质上就是善,是值得关爱的。‘自然’甚至呈现这样的意图:我们作为她高贵的受造物,如果关爱她,我们就得以继续存在”^{[6]xiv}。约纳斯(Hans Jonas)在他的《生命现象学》中也指出,生命具有目的性,这一目的性并非人类独有的特性,活的自然(living nature)也具有这一特性。“自从人类拥有了使自身成为目的,并有实施该目的的能力与自由以来,人类的目的性原则达到了顶峰。人类因而以该原则的名义,成为自己的第一责任目标。在此,我们的责任信念是:尽管有能力,但我们不损害自然创生的一切,这一切自有功用”^{[6]130}。进化论表明,在宇宙数百万年的演化中,生命的形成是一个小概率的、非常珍稀的事件。生命的自然循环建立在宇宙创生的规律之上,人类负有不轻易扰乱动植物生命的存在状态与秩序的责任。

小说中,动物的身体成了科学家欲望的客体和载体,被工具性地对待。混合了人类基因的器官猪为人类提供移植的器官,但也因为它们有了人类的基因与智力而引发了新的伦理问题。人工合成生物如狮羊、浣熊、器官猪等逃出动物实验场并危害人类与天然动物的生命。与这些合成动物一样,秧鸡人的赛博格特质其实是一种基因污染。科学家的建功立业,不应急功近利,而应从生命整体和物种互动的长远视野宏观地考量。公司警体系使用了严密的监控和暴力,一切为了利润,但各种环保组织仍旧在抵制他们的邪恶^③。即便是这些蹂躏自然者、杀灭动物者,他们的心灵与肉体也一直在承受“自然”的庇护,享受着“自然”的馈赠,却毫无感恩之心。灾难的发生有它自己的演化机制,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科学家或技术工作者的创新,应受到个人